

苏州城墙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之文献考释

吴恩培^{a, b}

(苏州市职业大学 a. 管理工程系; b. 吴文化研究所, 江苏 苏州 215104)

摘要:通过对《春秋经》《左传》记载中的越“入吴”,《国语》记载的“越王勾践”“袭吴”时“入其郛”,《史记》记载的吴国国都“城高以厚”及赵晔《吴越春秋》记载的“子胥……造筑大城”,《越绝书》记载的“吴大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的“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等作文献考释,首先论述苏州城墙春秋时建及在春秋时期的客观存在。接着,又从《越绝书》记载的战国时“春申君所造”之“楚门”,乃系苏州城门中的“破楚门”演变而来;另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中提及黄歇治吴时的水利举措“又大内北渚,四从五横,至今犹存”,分析唐代时犹存的古城“四纵五横”河道体系,系战国黄歇治吴时的遗存。其后,从清代中叶苏州古城“三横四直”的河道体系为唐代演变而来,指出苏州古城在战国时代就已烙上且牵延至清代尚存的这一文化印记,从而印证黄歇治吴时重修苏州城墙的事实。上述文献记载,清晰地表明如下结论:苏州城墙春秋时建及战国时重修。

关键词:苏州城墙;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文献;考释

中图分类号: G112;TU-098.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931(2012)05-0005-08

A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of Suzhou City Walls'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Renovation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U En-pei^{a, b}

(a. Management Department b. Research Institute of Wu Culture, Suzhou Vocational University, Suzhou 215104,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testifies the existence of the city walls of Suzhou with a series of references, which include “the entry into the walled city” when the Kingdom of Yue under the rule of Goujian conquered the Kingdom of Wu as recorded in *Chunqiu Jing*, *Zuo Zhuan*, and *Guo Yu*. In addition, *Shi Ji* recorded that “the city walls of Wu was tall and thick”, *Wuyue Chunqiu* written by Zhao Ye showed that “Zixu...built a grand city with walls”, *Yuejue Shu* recorded “the grand walled city of Wu” and *Shiji Zhengyi* written by Zhang Shoujie of the Tang Dynasty recorded that “Zixu built the city of Helv and made it a capital, which is the present city of Suzhou”. The paper also proves that the “Gate of Chu” “built by Prince Chunshen”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s recorded in *Yuejue Shu* actually evolved from the “Gate of Pochu”. The ancient river system existe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were actually the relics of Huang Xie’s rule of Wu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because *Shiji Zhengyi* mentioned that Huang Xie’s measures of city renovation include “leading the water system inside the city northward and making four vertical and five horizontal rivers, and all the rivers still exist today”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 river system of ancient Suzhou still existing in the Tang Dynasty evolved into the “three horizontal and four vertical” layout in the mid-Qing Dynasty. The paper sorts out this cultural phenomenon of Suzhou, which started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lasted till the Qing Dynasty, and proves the fact that the city walls of Suzhou were renovated during Huang Xie’s rule of Wu. All the above-mentioned literature lead to the distinct conclusion that the city walls of Suzhou were constructed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renovated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Key words: city walls of Suzhou; construction during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renovation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苏州先秦史的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而目前又存有争议的问题就是苏州古城的始建年代问题。

一般而言,一座古城的建城年代与古城城墙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收稿日期: 2012-06-08

作者简介: 吴恩培(1947—),男,江苏镇江人,教授,吴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吴文化。

城墙,是为防卫而建筑在城周围的高峻坚厚的围墙。中国古代城墙,习称为“城池”。汉代王充《论衡·须颂》说:“城墙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筑蹈之力,树立临池,国之功德崇于城墙。”^[1]“城池”围起的空间,即同时构成这座城市空间。从这一意义上讲,城墙造筑的年代,即等同于这座城市建城的年代。

《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755}春秋时期,一个国家的两件大事就是对祖先的祭祀和与别国的战争。前者慎终追远,使民德归厚;而后者则包括对外战争的进攻与防御。在古代城市各类建筑的社会功能中,“城池”就是这座城市防御(指“御外”——城外欲占领该城或掠夺该城社会财富的国内、国外的各类军事武装集团)的最主要的公共安全屏障。

一、文献记载的苏州城墙春秋时建及苏州城墙在春秋时期的实际存在

(一)《春秋经》《左传》记载中的“入吴”

孔子修订《春秋经》,为学界之共识。

《春秋经·定公五年》记载:“于越入吴。”^{[2]1559}《春秋经·哀公十三年》亦记载:“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于越入吴。”^{[2]1669}

而代表先秦史学最高成就的《左传》,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经》的相关记载。由此,与上述相对应的《左传·定公五年》记载说:“越入吴,吴在楚也。”^{[2]1559}《左传·哀公十三年》也记载说:“六月丙子,越子伐吴……丁亥,入吴。”^{[2]1670}

“入吴”,何解?

古代城墙(又作“城垣”)一般分两重,里面的叫“城”,即内城城墙(内城城墙内若还有城,即称为“子城”,如北京内城中的紫禁城即是);外面的叫“郭”“郛”,即外城城墙。春秋《经》《传》中,凡记载进入某城的外城均记为“入郛”或“入其郛”,而进入内城,则有“入城”和“入×”的句式。

1.“入郛”或“入其郛”:攻破城池的外城

“入郛”或“入其郛”句式,如《左传·隐公五年》:“伐宋,入其郛,以报东门之役。宋人使来告命。公闻其入郛也,将救之……宋人伐郑,围长葛,以报入郛之役也。”^{[2]1100}

《左传·隐公九年》:“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2]1116}

《春秋经·文公十五年》:“齐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2]555}

《左传·文公十五年》:“齐侯侵我西鄙,谓诸侯

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讨其来朝也。”^{[2]561}

《左传·成公十四年》:“八月,郑子罕伐许,败焉。戊戌,郑伯复伐许。庚子,入其郛。”^{[2]765}

《左传·襄公元年》:“夏,五月,晋韩厥、荀偃帅诸侯之师伐郑,入其郛,败其徒兵于洧上。”^{[2]815}

《左传·哀公十七年》记载说:“冬,十月,晋复伐卫,入其郛。将入城……十一月,卫侯自鄄入,般师出。”^{[2]1699}《左传》此条中“入其郛”和“将入城”句连用,表述“已入其外城,但尚未入其内城,但将入其内城”等的意思。此处“入郛”“入城”连用,其区别已表现得很清楚了。

2.“入城”:攻破城池的内城城墙并进入城内

《春秋经》《左传》的记载中,明写“入城”仅出现一次,即上文《左传·哀公十七年》所记载的“冬,十月,晋复伐卫,入其郛。将入城……”句。但《春秋经》《左传》暗记“入城”的案例,却有多处。

如《左传·庄公十四年》的记载:“郑厉公自栎侵郑,及大陵,获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请纳君。’与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杀郑子及其二子而纳厉公。初,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2]251}

郑厉公复辟的故事中,插入“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的故事。对此,孔颖达疏引服虔云:“蛇,北方水物,水成数六,故六年而厉公入。”^{[2]251}因此,这一突兀插入的情节,既隐喻“外蛇”——在城外的“郑厉公”与“内蛇”——在城内“郑子”之间的权力之争;又显示结果,“内蛇死”。显然,在这里它暗写“外蛇”郑厉公由南门“入城”——进入郑国国都。

此外,未出现“入城”字眼而以事实写“入城”处的案例有:

《左传·庄公二十一年》:“夏,同伐王城。郑伯将王,自圉门入,虢叔自北门入,杀王子颓及五大夫。”^{[2]26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圉门,王城南门。”^{[3]216}

《左传·定公六年》:“阳虎使季、孟自南门入,出自东门。”^{[2]1564}

《左传·哀公三年》:“冬十月,晋赵鞅围朝歌,师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门入,己犯师而出。”^{[2]1627}

以上诸例,均未明写“入城”,但却从“城”的某个城门入,实暗写“入城”。

3.“入×”:攻破城邑或诸侯国都的内城城墙并进入城内

《春秋经》《左传》中更多次出现的是“入×”的

句式。

“入×”中的“×”，有以下两种情况：

(1)指×城邑的内城城墙。“入×”，即指进入该邑内城城墙，亦即进入该城邑。

记载这一情况的实际案例如：

《春秋经·隐公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2]64}

《左传·隐公二年》：“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2]6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入者，以兵深造其国邑之名。”^{[3]22}

上述《春秋经·隐公二年》及《左传·隐公二年》的记载，参《春秋经·桓公十六年》“冬，城向”^{[2]207}及《左传·桓公十六年》载“‘冬，城向’。书，时也”^{[2]208}等记载可知，向城在鲁隐公二年（前721）前已存在，鲁桓公十六年（前696）的“城向”，仅是修城而已。

再如：《左传·隐公十年》：“庚辰，郑师入防。”^{[2]119}参《春秋经·庄公二十九年》“城诸及防”^{[2]292}及《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城诸及防’，书，时也”^{[2]293}等记载可知，防城在鲁隐公十年（前713）前已存在，鲁庄公二十九年（前665）的“城防”，亦仅是修城而已。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左传·成公九年》的记载：“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陈伐莒，围渠丘。渠丘城恶，众溃，奔莒。戊申，楚入渠丘。”^{[2]739}因“渠丘城恶”，楚“入渠丘”，即入渠丘城也。

(2)指国名并以之代指该国国都。“入×”，即指进入该国都内城城墙，亦即指进入该国都城內。

《春秋经》《左传》中，记载这一情况的实际案例有“入郑”、“入陈”、“入楚”（“入郢”）、“入宋”、“入蔡”、“入越”、“入齐”及“入吴”等。兹分述如下：

①“入郑”

前文论述《左传·庄公十四年》记载郑厉公复辟时，插写一段情节“初，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2]251}。这里以暗写方式记叙郑厉公由南门“入郑”（入城）——进入郑国国都的同时，也明确无误地说明郑国国都有城墙和“南门”，既有“南门”，当还有以其他方位（东、西、北）名之的城门。

鲁庄公十四年为公元前680年，而在这以前的鲁隐公十年（前713），据《春秋经·隐公十年》：“秋，宋人、卫人入郑。”^{[2]118}这就是说，在鲁隐公十年（前713）以前，郑国国都已造筑城墙。

而在鲁庄公十四年（前680）后，《左传》的相关记载中，依然出现“入郑”的字眼。如记载公元前597年史事的《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十二年春，楚子

围郑。旬有七日”（围郑，指包围郑国国都）。其后，因“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师”。其后，“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门，至于逵路。郑伯肉袒牵羊以逆。”^{[2]633-634}

就在郑国已屈服，两国媾和时，“夏六月，晋师救郑……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随武子曰：‘善。’”是时，晋军将领随武子表示赞同退兵，在说了一番赞同的道理后，随武子指出楚国“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讟，政有经矣。”^{[2]636}意思说，楚军去岁进入陈国国都，今年又攻入郑国国都，可是民众并不感到疲劳，楚国国君也没有遭致怨恨，这说明楚国为政已有常法入正轨了。

而同是《左传·宣公十二年》里还记载说，晋、楚为郑而进行的“邲之战”前，“嬖人伍参欲战。令尹孙叔敖弗欲，曰：‘昔岁入陈，今兹入郑，不无事矣。战而不捷，参之肉其足食乎？’参曰：‘若事之捷，孙叔为无谋矣。不捷，参之肉将在晋军，可得食乎？’”^{[2]642-643}

随武子和孙叔敖说的“今兹入郑”中的“入郑”，则是指前文“三月克之。入自皇门”句，即楚军从郑国国都城門中的皇門进入郑国国都。

由此，从“入郑”来分析“入×”的句式。首先，“入郑”之“郑”，本为国（郑国）名，在“入郑”句式代指郑国国都（郑都）。其次，“入郑”的前提是郑国有城墙（内城城墙），这从上述《左传·宣公十二年》中的“围郑”“进复围之”“克之”“入自皇门”等都可证实。其三，“克之”“入自皇门”等句，则更进一步证实楚军攻入郑都的内城城墙，且从内城城墙的“皇门”进入。

②“入陈”

上文随武子和孙叔敖的话中，都指出楚国“昔岁入陈，今兹入郑”，从而提及了“入陈”。

“入陈”事见上年《春秋经·宣公十一年》的记载：“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征舒。丁亥，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2]627-628}《左传·宣公十一年》补充说：“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杀夏征舒，轘诸栗门，因县陈……故书曰：‘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书有礼也。”^{[2]630-631}

陈国因内乱，楚国故伐之，“遂入陈”。“入陈”后，“杀夏征舒，轘诸栗门”。

“轘诸栗门”句，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释为：“轘，车裂也。栗门，陈城门。”^{[4]597}

由此可见，陈国国都有内城城墙和城门。故“楚

子入陈”，指的是楚庄王进入陈国国都。

因此，鲁宣公十一年（前598）后，《春秋经》和《左传》所记载的“入陈”，如《春秋经·襄公二十五年》的“郑公孙舍之帅师入陈”^{[2]1010}、《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晋为伯，郑入陈”^{[2]1024}、《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的“郑伯赏入陈之功”^{[2]1035}等，个中“入城”均当指进入陈国国都的内城。

③“入郢”“入楚”

“郢”为楚都，故“入郢”即“入楚”，且“入楚”亦含“入郢”。

第一种情况——“入郢”。

既是“入郢”，则涉及到楚国都城郢都城墙的造筑。关于郢都城墙的造筑，据《史记·楚世家》载：“文王熊贲立，始都郢。”^{[5]1695}对之，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纪南故城在荆州江陵县北五十里。杜预云国都於郢，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是也。”《括地志》又云：“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县东北六里，故郢城是也。”^{[5]1696}

由上可知，楚文王熊贲时，徙都郢。时，郢都尚未有城郭。故“至平王，更城郢”。然而，《括地志》的这一判断并不准确。楚“城郢”——郢都城墙的起始造筑，远在楚平王前的楚庄王元年（前613）就已开始。

《左传·文公十四年》载：“楚庄王立，子孔、潘崇将袭群舒，使公子燮与子仪守，而伐群舒。二子作乱，城郢，而使贼杀子孔，不克而还。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将如商密。庐戢黎及叔麋诱之，遂杀斗克及公子燮。”^{[2]552}

《左传·文公十四年》说：“初，斗克囚于秦，秦有穀之败，而使归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乱。”^{[2]552}

两个政变者无意中却成了郢都城墙最早的建造者。由于系非常时期和特殊目的的开工，随着叛乱的平复，这一工程很快成了无以为继而并未完工的“烂尾”工程。

事隔五十四年后，在记录公元前559年事件的《左传·襄公十四年》中，“楚子囊还自伐吴，卒。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2]931}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对上述“城郢”句释曰：“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仪因筑城为乱，事未得讫。子囊欲讫而未暇，故遗言见意。”^{[4]920}

显然，这里的“城郢”，只是对未完工的郢都城墙进行增筑或修复了。

距子囊所说“必城郢”又过了四十年后的公元

前519年，《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又记载说：“楚囊瓦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卫，城无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今吴是惧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获，能无亡乎？昔梁伯沟其公宫而民溃。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场，修其土田，险其走集，亲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邻国，慎其官守，守其交礼，不僭不贪，不懦不耆，完其守备，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今土数圻，而郢是城，不亦难乎？’”^{[2]1437-1439}

对《左传》本年的“城郢”，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释之说：“楚用子囊遗言，已筑郢城矣。今畏吴，复增修以自固。”^{[4]1505}而记载了同一年、同一事的《史记·楚世家》则记载说：楚平王“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开吴。吴使公子光伐楚，遂败陈、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5]1714}

楚平王十年为公元前519年，即鲁昭公二十三年。这一时期，在与吴国的争斗中，又是“楚恐，城郢”。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杜预云‘楚用子囊遗言以筑郢城矣’，今畏吴，复修以自固也”^{[5]1714}。据杜预的意思，子囊“必城郢”后，郢都城墙或已修复完成。现又过了四十年，因“畏吴”，故再次“复修以自固”。

综上可知，无论是杜预所说的“复增修以自固”，抑或是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杜预所说的“复修以自固”，这里的“城郢”的“城”，都是“复增修”或“复修”的意思。

由此梳理，可知郢都城的城建档案如下：

鲁文公十四年（楚庄王元年，前613）郢都城墙起始造筑，未完成；

鲁襄公十四年（楚康王元年，前559）楚令尹子囊，临死前说起“城郢”——增筑以完成；

鲁昭公二十三年（楚平王十年，前519），楚令尹囊瓦，“城郢”复增修以自固。

因此，至鲁定公四年（楚昭王十年，前506）时，楚郢都城墙的建造和修筑已历百年以上。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春秋经》《左传》记载的“入郢”情况如下：

《春秋经·定公四年》载：“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楚囊瓦出奔郑。庚辰，吴入郢。”^{[2]1541-1542}对“吴入郢”句，杨伯

峻《春秋左传注》释曰：“郢，《公羊》、《谷梁》俱作‘楚’。”^{[3]1534}本年（指鲁定公四年），吴国长途奔袭楚国，吴、楚战于柏举，楚败，吴攻入郢都城内。时，楚昭王离开郢都而出奔逃亡。次年（指鲁定公五年），据《左传·定公五年》载：“楚子入于郢。”^{[2]1562}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注：“吴师已归。”^{[4]1641}故吴军撤回国内后，出奔逃亡的楚昭王又回到了郢都城内。

《左传》记写吴“入郢”处，还有《左传·定公四年》：“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2]1555}《左传·哀公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左司马馯、申公寿余、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缙关，曰：‘吴将泝江入郢，将奔命焉。’”^{[2]1629}

第二种情况——“入楚”。

对“吴入郢”句，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释上述《春秋经·定公四年》“庚辰，吴入郢”句时指出：“郢，《公羊》《谷梁》俱作‘楚’。”^{[3]1534}故此，在这里“入楚”与“入郢”意义相同，都是指进入楚都郢都。

《左传》记写的“入楚”如下：

《左传·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吴帅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陈、蔡欲为名，故请为武军。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请藩而已。’乃藩为军。蔡公使须务牟与史卑先入，因正仆人杀大子禄及公子罢敌。”^{[2]1313-1314}

《左传·定公十五年》：“吴之入楚也，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2]1606}

《左传·哀公元年》：“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2]1613}

《左传》上述三条“入楚”，后两条与前述“吴入郢”有关，故“入楚”即“入郢”。首条的“入楚”依语境“及郊”及“蔡公使须务牟与史卑先入”句可知，所“入”处为楚都郢都。

第三种情况——《左传》同时记写“入楚”“入郢”。

郢为楚国都，“入郢”即为入楚国都。而在“入楚”的句式里，“楚”本为国名，但在此语境下，“楚”代指楚国都。故如前述，“入楚”与“入郢”意义相同。正因有此逻辑关系，故在《左传·定公四年》的一段文字中，“楚可入也”与“吴入郢”同时出现。

《左传·定公四年》的该段文字为：“十一月，庚午，二师陈于柏举。阖庐之弟夫概王，晨请于阖庐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弗许。夫概王曰：‘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

也。’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子常奔郑。史皇以其乘广死。吴从楚师，及清发，将击之。夫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又败之。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五战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针尹固与王同舟，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2]1555}

从上述的案例中，可得出如下结论：

“入×”句式，若“×”为国名，则在“入×”句式里，“×”代指该国国都。反之，亦可倒推出在“入×”句式里，若“×”为国名，则“×”在代指该国国都的同时，也显示“×”城必有城墙（或内城、或外城，视语境及具体情况酌定），否则，无以“入”。同时，“入×”还显示出“入×”的主语（即主动者，多为进攻的一方）或是攻破“×”城城墙，并从“×”城城墙的某一城门进入该城内；或是以其他方式从“×”城城墙的某一城门进入该城内。

作为印证，下列《春秋经》《左传》记写的“入宋”“入蔡”“入越”“入齐”，均如此。

《左传·隐公十年》：“九月，戊寅，郑伯入宋。”^{[2]1120}

《春秋经·庄公十四年》：“秋，七月，荆入蔡。”^{[2]250}

《左传·哀公元年》：“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携李也。遂入越……三月，越及吴平。吴入越，不书，吴不告庆，越不告败也。”^{[2]1610-1612}

《春秋经·哀公六年》：“齐阳生入齐。”^{[2]1634}《春秋经》此条的“齐阳生”指齐景公的儿子公子阳生，后为齐悼公。故本条主语和前述“入×”的主语多为进攻一方有所不同。

由此来探讨前文提及的《春秋经》《左传》中记载的“入吴”。

上述“入吴”句式的主语，均为“越”。“入吴”的时代背景，均为吴军事力量在外（或阖闾伐楚，或夫差于黄池盟会）时。

尽管《春秋经》和《左传》中关于“吴都”的建造并未留下任何记载，更谈不上像楚都郢都的建造那样留有详细记载，但《春秋经》《左传》记载的“入吴”，依据《春秋经》《左传》中一以贯之的“入×”记事句式，可以说，这里还是为我们留下了春秋时期吴都城真实存在的记录。

由此再来看《越绝书》卷第七记写“吴晋争疆，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王闻之，涉江袭吴，去邦七

里而军阵”及“吴王闻之，去晋从越。越王迎之，战于五湖。三战不胜，城门不守，遂围王宫，杀夫差而僇其相”^{[6]55}等句，句中的“三战不胜，城门不守，遂围王宫”，足堪为《春秋经》及《左传》中“入吴”的注脚。

《左传·哀公九年》记载，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伐齐作准备：“秋，吴城邗，沟通江、淮。”^{[2]1650}对“城邗”二字，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释为：“于邗江筑城穿沟。”^{[4]1762}因此，“城邗”其意即为在“邗”地造筑城墙，并同时圈起了一个“城”——“邗城”（今扬州），简称为“邗”。这座当初因吴王夫差“城邗”而诞生的扬州，和苏州一样，同列入国务院1982年批准《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且“秋，吴城邗，沟通江、淮”这几个字，也成为中国大运河沿河8个省份35个城市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最重要的文献基础和表明中国大运河的历史起自春秋的最早文献记载。而这里更值得一说的是，吴国既能到长江以北的地方去“筑城”，对自己的都城又如何能不筑？

（二）《国语》《史记》等正史关于苏州城墙在春秋时期实际存在的记载

1.《国语》中记载的“越王勾践”“袭吴”时，“入其郭”

先秦时另一部重要著作《国语·吴语》记载：“越王勾践，乃率中军泝江以袭吴。入其郭，焚其姑苏，徙其大舟。”^[7]从《国语》此段文字可看出，春秋时“吴都”不但有内城，且有外城——“郭”，亦即“郭”也。

2.《史记》中记载的吴国国都“城高以厚”

在我国另一部重要史学著作司马迁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当记写孔子批准的其弟子子贡进行个人穿梭外交——“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时，文中记述子贡“至齐，说田常曰：‘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狭以泄’”后，接着又记述子贡怂恿田常说“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5]2197}。显然，从子贡口中，我们可以看出春秋吴王夫差时期的吴国国都的外形或外在观感是“城高以厚”。

（三）其他史籍关于苏州城墙春秋时建及苏州城墙在春秋时期实际存在的记载

上均为正史记载，而其他文献的记载有：

1.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记载的“阖闾曰：‘寡人委计于子。’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

《吴越春秋》卷四载，阖闾执政后，面对吴国“君无守御，民无所依”，即西有强大的楚国，南有楚国的盟国——越国——的夹击，而地处太湖平原上的吴

国都城梅里，其无城可守亦无险可守的状况，令吴王阖闾内心堪忧。时，伍子胥进入吴国的最高决策圈。故此，在“与谋国政”时，伍子胥便向阖闾提出了修筑国都城墙的建议：“臣闻治国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阖闾曰：‘安君治民，其术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廩，治兵库，斯则其术也。’阖闾曰：‘善！夫筑城郭，立仓库，因地制宜，岂有天气之数以威邻国者乎？’子胥曰：‘有。’阖闾曰：‘寡人委计于子。’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10]24-25}

吴王阖闾把设计、建造吴国大城的事委托给了伍子胥，伍子胥受命东去，“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吴越春秋》接着记载了伍子胥造筑的“大城”的规模：“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筑小城，周十里，陵门三，不开东面者，欲以绝越明也。立闾门者，以象天门通闾阖风也。立蛇门者，以象地户也。阖闾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闾门以通天气，因复名之破楚门。欲东并大越，越在东南，故立蛇门以制敌国。吴在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上反羽为两颯以象龙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10]25}

2.东汉袁康、吴平《越绝书》记载的“吴大城”

袁康、吴平《越绝书》：“吴王大霸，楚昭王、孔子时也。”^{[6]9}“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东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阖庐所造也。吴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6]9-10}“吴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广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门三，皆有楼，其二增水门二，其一有楼，一增柴路。”^{[6]10}上述《越绝书》的记载中，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提到了“吴大城”的概念。

《越绝书》卷七记写孔子批准的其弟子子贡进行个人穿梭外交——“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时，用了与上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相类似的词语：“君不如伐吴。吴城高以厚，池广以深……”

3.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的“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

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5]1445}

前述《越绝书》的记载提到了“吴大城”的概念，而此处张守节《史记正义》中，又提到了“阖闾城”的概念。从这些互为印证的文献记载可知，“吴大城”

就是“阖闾城”，就是“今苏州也”。

其后，一些著名的史地载籍包括各类方志，如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南宋范成大的《吴郡志》，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又名《二十一史方輿纪要》），清代阎若璩的《四书释地》、顾栋高的《春秋大事年表》、范本礼《吴疆域图说》，民国崇辨蒙塾编辑、张一麀著《吴郡地理志要》及历代《苏州府志》《吴县志》等均沿袭此说。

（四）当代史家的论述——“苏州城之古为全国第一”

如果说，《春秋经》《左传》《国语》《史记》的记载构成苏州城墙史学文献记载主体的话，那么《吴越春秋》、《越绝书》和张守节《史记正义》中的相关论述及后世史地载籍包括各类方志、历代多部《苏州府志》、《吴县志》等则是这一记载的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了关于苏州城墙建于春秋时期的完整的文献记载链条，同时，也构成了完整的学术论述链条。

而体现这一历史的延续的当推苏州籍的中国现代最著名历史学家，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的顾颉刚所坚持的“苏州城之古为全国第一”的史学观点了。

顾颉刚先生在其《苏州史志笔记》中曾记载：“一九五一年农历新年，苏州市长王东年偕同党方开老人会时，予亦被邀前往，席上请来宾发言，予因述‘苏州城之古为全国第一，尚是春秋时物，其次为成都，则战国时物，其所以历久而不变者，即以为河道所环故也。今议拆城，拆之则河道前横，不足以便交通。若欲造桥，则当桥堍开新门足矣。奚必毁古迹……苏州城殆因予言而得保存乎？是所望也。”^[8]这一段话，既是顾颉刚先生“苏州城之古为全国第一”学术观点的首次表述，也同时透露出先生表述此语正是在新中国建国之初即有“拆城”之议的情况下，说之以理，动之以情，力图“保存”“苏州城”而向时任苏州市长的王东年的建言。从这一意义上讲，顾颉刚先生也可说是对苏州古城保护建言的第一人。惜乎先生之论，仍未挡住七年后的“拆城”之举。而关于“苏州城之古为全国第一”的学术观点，在时隔22年后的1983年，顾颉刚先生又在发表的《中国古代的城市》一文中坚持这一观点，并再次指出说：“苏州是历史遗迹最多的地方，苏州城是吴王阖闾时伍子胥所造，到今已有两千四百多年历史，是全中国最古的一座城池。”^①顾颉刚先生的上述论

断，同时也成为苏州城墙筑于春秋、苏州古城建于春秋之时的文献记载之一。

二、文献记载的苏州城墙战国时的重修

（一）“春申君所造”的“楚门”

春秋后期，吴亡于越。战国时，越亡于楚。公元前248年楚相黄歇徙封于吴（今苏州）。《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春申君黄歇改“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5]2394}

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对之释为：“墟音虚。今苏州也。於城内小城西北别筑城居之，今圯毁也。又大内北渚，四从五横，至今犹存。又改破楚门为昌门。”^{[5]2394-2395}

由此可知，其时包含江南吴地在内的东楚之地，远避兵锋。黄歇以吴为都邑，着力营建，构建封地的政治、经济中心。

黄歇与其子“假君”（即代理君主之意），“二君治吴凡十四年”^{[6]17-18}。因此，战国时期，实际由黄歇父子主持了对苏州古城及城墙的重建和修复。而作为战国时苏州城墙重修的文献依据，则是《越绝书》中所记载的“春申君所造”之“楚门”句。

《越绝书》记载原句为：“楚门，春申君所造。楚人从之，故为楚门。”^{[6]25}

在这以前，苏州城无“楚门”，而有“破楚门”的记载。如《吴越春秋》载伍子胥造筑的苏州城门中即无“楚门”，但有“破楚门”的两处记载。如下：

“立闾门者，以象天门通闾阖风也……闾阖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闾门以通天气，因复名之破楚门。”^{[9]24}

“诸将既从还楚，因更名闾门曰破楚门。”^{[9]47}

由此可知，“闾门”乃“复名之破楚门”，也就是说“闾门”还有个曾记载春秋时吴国一段辉煌历史的名字——“破楚门”。

春申君黄歇治吴时，故吴地已入楚境，在这种情况下，“闾门”再“复名之破楚门”，显然已不适合，毕竟黄歇为楚相。且从“楚门”为“春申君所造”来看，是时，“闾门”或已遭受战火毁坏、或已倾颓，故春申君重修苏州城墙时，是在原“闾门”的基址上，重修闾门。

既是在原址重建，当然也极易在民间唤起“闾门”的“复名”记忆——“破楚门”，尤其是族群矛盾激化时，这一记忆会激活吴人心中曾有过的历史

① 顾颉刚：《中国古代的城市》，《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第3期。

辉煌并借之表达对楚人治吴现实的不满。因此,为免民间再呼之曰“破楚门”,故将之名为“楚门”,就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政治、文化举措了。因此,这一时期,阖门的“复名”为“楚门”,这从上述《越绝书》记载中“阖门”和“楚门”同时并存可得以证实。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说黄歇治吴“又改破楚门为昌门”^{[5]2395},在印证这一事件的同时,也构成了黄歇治吴时重修苏州城墙的文献记载链条了。

记录着春秋时期吴国征伐楚国这一辉煌历史的“破楚门”,在后世的方志文献中常常出现,如唐代陆广微《吴地记》载:“阖门,亦号破楚门,吴伐楚,大军从此门出。”^[10]宋代范成大《吴郡志》:“阖门,《文选注》:‘吴王阖闾立阖门,象天闾阖风也。’《吴越春秋》曰:‘城立昌(阖)门者,象天通闾阖风也。’《南史》及传记中或书作昌门,盖字之讹。《吴越春秋》又曰:‘昌(阖)门亦名破楚门,吴伐楚,自此门出也。’”^[11]然而,黄歇治吴时重修并命名的“楚门”却再也没出现。毕竟,在吴地的城墙中,出现烙上楚地文化名称的城门名——“楚门”,在文化不协调的同时,也颇难为吴人接受。

除黄歇重修并命名的“楚门”外,还有一处与黄歇治吴时有关的建筑——“罍囿”。

《越绝书》卷二载:“巫门外罍囿者,春申君去吴,假君所思处也。去县二十三里。”^{[6]18}

俞纪东《越绝书全译》释“罍囿”为:“门外之屏,此指城门当门的墙。”^[12]巫门,即平门也。

上文据《越绝书》分析“楚门,春申君所造”,故张守节《史记正义》中“改破楚门为昌门”的主语当为黄歇,且“於城内小城西北别筑城居之”的主语,亦当为黄歇。而“今圯毁也”则是指张守节所处时代——唐代——时的状况。这样,从《史记·春申君列传》相关记载及参照张守节的释义则可看出,战国时的春申君黄歇到苏州时,昔日的阖闾城(苏州)已为一片废墟,黄歇以此自为都邑,并于城内小城西北,另筑一个小城居住(黄歇的这一住地,是城内小城——相当于其他文献记载的“子城”——中建有一处高墙建筑,俨然一“城堡”耳),这个小城(即前述的“城堡”)至唐代时已圯毁。

(二)黄歇治吴时的水利举措及其在后世的遗存

由此,我们再来看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中提及黄歇治吴时的水利举措:“又大内北渚,四从五横,至今犹存。又改破楚门为昌门。”^{[5]2394-2395}这就是说,黄歇治吴时在城内开掘的河道水渚,四纵五横,

至唐代时还存在。

这里张守节透露出十分重要的讯息:唐代时犹存的古城“四纵五横”河道体系,系战国黄歇治吴时“大内北渚,四从五横”的遗存。其后,从唐代再到清代,千余年的演变,使唐代时犹存的古城“四纵五横”河道体系至清代中叶已成为苏州古城“三横四直”的河道体系。

对此,我们如果采用倒推的叙述方法,则可表述为:清代中叶苏州古城“三横四直”的河道体系,系唐代时“犹存”的苏州古城“四纵五横”河道体系演变而来。而唐代时犹存的古城“四纵五横”河道体系,又系战国时黄歇治吴时“大内北渚,四从五横”的遗存。

清代中叶“三横四直”河道体系的实证,为现存于苏州景德路城隍庙工字殿墙上的《苏郡城河三横四直图碑》。该碑分正反两面,正面刻《重浚苏州城河记》,记载了清代嘉庆元年(1796)8月至次年5月,苏州城内全面疏浚河道的经过。反面刻有《苏郡城河三横四直图》,图的上部刻有《苏郡城河三横四直图说》。因此,黄歇治吴时开挖且唐代时尚存的“大内北渚,四从五横”,就隐然成为清代时尚存的“苏郡城河三横四直”河道体系的先声和演变的最早母本了。

苏州古城在战国时代就已烙上且牵延至清代尚存的这一文化印记——内城河道体系,其间还有唐代人证实战国时代内城河道体系至唐代时犹存的记载。它所构成的文献记载链条,意义十分重大。

首先,它印证黄歇治吴时“以自为都邑”的“城故吴墟”,就是伍子胥造筑,且曾有城门曰“阖门”“复名之破楚门”,而黄歇重修后命名为“楚门”的“阖闾城”。

其次,战国时重修苏州城留下的内城“四从五横”河道体系这一特殊的文化印记,在清代中叶演变为“三横四直”,它既有汉、唐时的文献记载,又有清代时的实物证实,更有今日苏州城内河道体系的证明。所有这些,就不是他处被指说为“阖闾城”的地方、或被指说为吴国都邑城址的地方所能有的了。

由此,可以认定:当春秋时的阖闾城(即今苏州古城)已成为“吴墟”时,黄歇父子来此“以自为都邑”,并在原城址的基础上,疏浚河道,修复城墙、城门,大建宫室,从而重修古城。

(三)司马迁的直观印证——百年后司马迁的南游“适楚”“观春申君故城”

对黄歇重修的战国时的苏州城,(下转第84页)

在融合性上,社团组织税法知识竞赛,邀请税局官员“送税进校园”,邀请企业、行业专家进校园开设公开课等各类专业性课外活动,增强课程学习的文化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激情。这样,实现了学习环境上学校与社会的融合,促进了学习目标由知识学习向能力应用的转变。

(四)有效促进学习效果过程评价的形成

在开放的学习过程绩效考核体系上,吸收校外行业企业专家,共同开发了考核指标和考核结点,实现了第三方评价。根据三阶能力目标的要求,每一个模块、每一个目标、每一个行为或者每一个思考均将纳入考核指标,并参与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实现了全过程评价。

在融合性上,在课程评价时,让学生参与自评和互评,结合学生自评、学生互评、教师评价和师生共评的方式,公平、科学的给学生评价。这样,实现

了考核主体的融合、考核要素的融合,促进了评价体系由封闭狭隘式评价向开放全程式评价的转变。

参考文献:

- [1] 何牧,刘东辉,季秀杰,等.应用型本科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J].哈尔滨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4):65-66.
- [2] 高媛.高素质应用型会计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J].吉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4(3):100-102.
- [3] 黄跃忠.建构主义抛锚式教学模式在税收基础教学中的应用[J].现代企业教育,2010(8):62-63.
- [4] 顾瑞鹏.基于“价值链”任务化教学的设计创新与实践——以税收类课程为中心[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1,28(4):101-103.
- [5] 齐瑜,刘松.学习者知识体系构建过程模型的研究与应用[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3(3):95-97.
- [6] 雷霆.情景教学模式在高职会计专业《税收实务》实践教学中的运用[J].中国化工贸易,2011(12):79-80.

(责任编辑:施建平)

(上接第12页)西汉时的司马迁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5]2399}对司马迁“适楚”距“黄歇治吴”的时间,梳理一下即可算出:

前文述,公元前248年,黄歇请封江东,后,黄歇治吴“凡十四年”,可推出黄歇治吴的具体时间为:前248年至前235年。而司马迁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20岁时,司马迁游历各地,时为元朔三年(前126)左右。

因此,公元前126年,司马迁游历时,距黄歇治吴的最后一年——前235年——相距109年。

可以说,黄歇在原阖闾城址的基础上重修古城的百余年后,司马迁来此“观春申君故城”,并作出“宫室盛矣哉”的评价。应当说,百余年的时间并不长,尽管是时历经秦汉相争的战火,苏州古城也遭受破坏,但司马迁曾经到过江东——今天的苏州——一带考察。对自己的考察,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有多次叙述。如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说自己:“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5]3293}在《史记·河渠书》中又说:“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5]1415}这两处文字,与前引的司马迁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所说的“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互为印证,从而证实司马迁“上姑苏,望五湖”及“适楚,观春申君故城”等考察活动。

三、结论:苏州城墙春秋时建及战国时重修

本文如题,对“苏州城墙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作“文献考释”,故只有且也只能“仅限于文献记载和古人的注释”了。

苏州古城及其城墙,有上述多部文献对其在春秋时期的实际存在进行记载,这在国内诸多历史文化名城中也属罕见。而这些历史的记载,远不是一句“苏州城最早建于汉代”所能抹去的,同时,它也清晰地表明如下结论:苏州城墙春秋时建及战国时重修。

这一结论,也经历了1957年、2005年及2011年苏州三处城墙的考古印证。限于本文“文献考释”的论述限制,故不作展开,留待另文叙述了。

参考文献:

- [1] 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309.
- [2] 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4]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6] 袁康,吴平.越绝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55.
- [7] 国语[M].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04.
- [8] 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37.
- [9] 赵晔.吴越春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 [10] 陆广微.吴地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17.
- [11] 范成大.吴郡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21.
- [12] 俞纪东.越绝书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65.

(责任编辑:时新)